



中国传统学术史

卢钟锋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学术史

卢钟锋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学术史

卢钟锋 著

责任编辑 陆树庆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字数 404 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215-04166-2/G·636 定价:28.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专门论述中国传统学术史渊源流变的学术著作。始于先秦时期,迄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着重考察中国传统学术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及其与中国历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的关系,从学术文化的层面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以及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内容翔实,论据充分,结构严密,脉络清晰,观点鲜明,说理性强,是建国以来在传统学术文化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可供研究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化史之用。



卢钟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生，广东省潮州市人。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同年秋，考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攻读中国思想史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宋明理学史》上下卷（合著）、《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合著）、《中国近代哲学史》（合著）等，论文几十篇。

自序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多年来从事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一个成果。我萌发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念头,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宋明理学史》^① 撰写工作的时候。当时,根据分工,我除了负责全书的统稿和学术组织工作外,还承担了宋代理学家胡安国、胡宏、张栻,明代江右王门理学诸子以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时期理学的总结诸章的撰写。为了写好《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两章,我认真通读了黄宗羲的这两部学术史巨著^②,阅读了与此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我深为这两部学术史巨著内容之宏富、材料之翔实、论述之精当、体例之严谨和文字之晓畅所叹服。对这两部学术史巨著的研究引发了后来我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兴趣。我以对这两部学术史的研究为基点,往前一直追溯到先秦诸子的著作,往后一直延伸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徐世昌的《清儒学案》,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六七百年。

① 《宋明理学史》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分上下两卷,共134万字,系“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人民出版社于1984、1987年先后出版该书的上卷和下卷。

② 《宋元学案》一百卷,黄宗羲手创,经其子百家、私淑全祖望续修成书。

1986年冬,我开始查阅历代有关学术史方面的文献,并按年代顺序修成书目长编,作读史札记,为撰写本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传统学术史有着深厚的文化资源。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文化资源更是与日俱增。宋明以来,史家辈出,史著林立,至清尤盛。面对中国传统学术史深厚的文化资源和浩瀚的文献资料,要将它们从原来无序的散在整理成有序的系统,并非短时间内所能成就,必须假以时日,潜心研读,精心别择,提要钩玄,才能从中理绎出发展的脉络来,作出科学的说明。于是,我下定决心:不求速成,但求有信,以便如实地反映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全貌。

光阴荏苒,倏忽至今,时届十载。期间,由于诸多原因,这项研究工作时断时续,进度不尽如人意。但我念兹在兹,不改初衷。每有心得,即欣然命笔,日积月累,终于成书。

本书之作,我时刻以“务实求真”自勉。务实,就是重实证,“持之有故”,不发“游谈无根”之论;求真,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戒以今人的思想型塑古人、改铸历史。我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系统考察和研究,阐明这一文化现象的发展变化与历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的关系,探索其间的规律和特点,从学术文化的层面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以及关于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书之作只是一种尝试。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祈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导 论

——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历史分析

中国传统学术史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代的学术史。为此,这篇导论将从分析其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开始。

一、研究对象及其基本内涵

中国传统学术史是对中国历代的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所作的概括和总结,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具有“史”的性质特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有其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中国传统学术史就是关于中国历代的学术史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专门研究中国历代的学术史是如何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的。

我之所以把研究中国历代学术史的源流演变统称为中国传统学术史,是因为从文化形态看,中国历代的学术史属于传统型的学

术史。

所谓传统型的学术史,是指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传统性质的学术史。

从内容看,中国历代的学术史所要概括和总结的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属于以儒学为主体,儒、佛、道诸家思想兼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例如,就学术思想而言,有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的汉学、宋学和今文经学等。就学术流派而言,有先秦时期的儒、墨、道、名、法、阴阳、兵诸家,汉唐时期的经学家(包括:西汉的今文学家 and 东汉以来的古文学家),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包括:濂、洛、关、闽诸学派和程、朱、陆、王诸家)等。不仅如此,汉魏以来的佛、老之学及其宗派也属于中国历代的学术史所要概括和总结的内容。

从形式看,中国历代的学术史用以概括和总结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的方法是传统的方法。具体地说,是中国传统史学修史通常所采用的“寓论于史”的实证方法,并体现为三种主要的史书编纂体裁,即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简称“三体”)。中国历代的学术史编修基本上继承了上述的修史方法。所谓基本上,是说尚有例外。如先秦时期的概论体学术史是中国历代学术史的最初形式,属于以“论”为主的体裁,与详于“史”而略于“论”的“三体”的编纂体裁不同。然而,汉唐以来历代的学术史形式主要本之“三体”。例如,汉唐时期的传记体和书志体,宋明时期的学案体,以及汉魏以来佛、道宗教学术史所采用的类传体、编年体和灯录体等,

就是基于“三体”而又略加变通的学术史编纂体裁^①。上述情况，至清末以前，循而未改。

本世纪初，由“西学东渐”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波及到学术史研究领域，产生了章节体的学术史形式。如果说，基于“三体”的历代学术史编纂体裁属于传统修史方法的范畴，其主要特点是：详于“史”而略于“论”，认为“论”在“史”中，“史”备则“论”自见；那么，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则属于近代修史方法的范畴，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问题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

必须指出，尽管这种章节体的学术史已经成为本世纪学术史的主要形式，但是，汉唐以来盛行的传统形式的学术史在本世纪前半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清末余炳文的《儒史略》、黄嗣东的《道学渊源录》、民初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以至三十年代徐世昌的《清儒学案》等，或为编年体的学术史，或为传记体的学术史，或为学案体的学术史，均属于传统形式的学术史。中国传统学术史既然以传统形式的学术史为研究对象，那么，上述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术史形式也应在其考察范围之内。三十年代以后，传统形式的学术史为近代形式的学术史所代替。虽其间或有以“学案”名书者，但名同而实异，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学术史了。因此，它与近代形式的学术史一样，不再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对象。

总之，中国历代的学术史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方法编修而成的学术史，从内容到形式均具有鲜明的传统性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学术史就是以其为研究对象，专门研

^① 佛、道宗教学术史所采用的编年体本之“三体”，自不待言。至于它所采用的类传体，则是兼有传记体和书志体的体裁特点。只有宋代的灯录体是禅宗史家的独创。它按佛法传法世系为禅师立传颇类似于学案体学术史按儒家的道统传承为理学家明“道”续“统”。因灯录体出现在前，学案体出现在后，故有学者认为学案体本之灯录体。本书赞同这一观点。

究这种传统形式的学术史兴废盛衰的全过程及其与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间的关系,具有“史”的学术特色,故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二、研究思路及其基本线索

中国传统学术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受社会思潮的制约并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如所周知,中国学术史之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现存《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显学》诸篇,就是旨在概括和总结先秦诸子学说及其流派的学术史开篇之作。这些学术史的开篇之作有一个特点,即它们研究先秦诸子学说主要是出于经世的需要。例如,《庄子·天下》以“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开篇,把批判总结诸子治世之“方术”作为全篇的主旨;《荀子·非十二子》以“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非难“十二子之说”,而以“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为治国之方;《韩非子·显学》则以“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贬斥“孔墨显学”,主张“明主”以“法度”治国;等等。这说明中国传统学术史从其发轫之时起,就十分关心现实,注重从经世的角度对诸子思想进行批判和总结,它反映了先秦时期兴起的子学思潮重在明“内圣外王之道”、求经世为治之“方术”的历史事实。先秦时期这一子学研究之风,迄于汉初,循而未改。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和刘安的《淮南子·要略》都是出于“务为治”的需要而批判总结先秦诸子学说的学术史篇章。这是汉初的子学余绪在学术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贯彻。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子学式微,儒学独显,立为官学,定于一尊。以经义断事,以治经为士子进身之阶成为一时风尚,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由子学向儒学(经学)转变的新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六经》)立志的先声。这些《传》、《志》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它们反映了西汉中期以来尊经崇儒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实际情况。不仅如此,两汉时期经学内部今古文学的变迁也直接影响到上述《传》、《志》的编修。例如,《史记·儒林列传》叙述经学(《五经》)源流是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次序排列的。这是今文经学家的排列法。它与司马迁本人主今文经学,而他作《史记》时尚无今古文学之分的情况是直接相关的。东汉时,古文经学盛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叙述经学(《六经》)源流是按照《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次序排列的。这是古文经学家的排列法。尽管论经学观点,班固属于今文学家,但是他修《艺文志》却取法古文学家刘歆所作的《七略》。可见,社会思潮、学术风气对当时学术史的编修影响之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援儒入道(家),儒学式微,佛、道崛起。社会思潮的转向导致了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重点的转移,由重“儒林”转向重释、老,由重儒家经典转向重佛、道经典。魏收的《魏书》首开正史为释、老设《志》立《传》的先例,而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则首开私家著述佛教史籍之先河。事实表明:社会思潮的转向对学术史研究重点的转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至唐,由于朝廷的提倡,一度处于低潮的儒学再度兴起,因而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这一社会思潮的起伏反映到学术史的研究上,就表现为:一方面,有关宗教史的著述保持常盛

不衰的势头,僧传、教史和教派史大量面世;另一方面,以叙述经学源流为宗旨的正史《艺文志》的编修,在中断了多年之后又重新再现于正史。例如,唐初修《隋书》就是根据魏征的建议,专门设立了旨在叙述经、子之学流变的《经籍志》。这是正史有《经籍志》之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私家著述的经学史篇章。例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就是以古文经学家的观点对“五经六籍”的源流进行了辨析和总结。然而,就学术史著述的总量看,唐代有关佛、道的宗教史籍远远超过儒学(经学)史籍;而在以叙述经学源流为宗旨的经学史著述中还存在着既尊经又重道(家)的情况。例如,《经典释文·序录》就将《老》、《庄》这类“子书”与儒家经典并提,置于“经典”之列,故清人称此书“犹沿六代之余波”,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魏晋以来重佛、道的思想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唐代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终唐之世,尚未完成,佛、道势力在学术文化领域仍相当强大。唐代儒学的复兴运动要到宋代理学的确立才告完成。

理学兴起于北宋。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和石介开其端,周(惇颐)、张(载)、二程奠其基,南宋朱熹集其成。它一反汉唐时期治经重文字训诂的传统,而以发明“圣人”的“性道微言”为宗旨,从而开创了儒学研究的新局面,故后世学者称理学为“新儒学”。中国传统学术史从此进入由经学向理学转变的新时期。

自理学之兴,为学讲“性道”、治经重“义理”、修史续“道统”,蔚然成风。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建构了以天理论为核心,以心性论、理一分殊论、格物致知论和持敬修养论为基本框架的理学思想体系,而且还坚持以儒家的道统论为理学修史,明“道”续“统”。他的《伊洛渊源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书名看,此书首冠“伊洛”是为了突出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的正宗地位。次以

“渊源”是为了确立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上承孔孟之道的历史统绪。其为理学明“道”续“统”之意甚明；而此书通过为理学明“道”续“统”，实际上是对宋代理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因此，朱著《伊洛渊源录》堪称为理学史的开山之作。后世学术史之为理学修史，其源盖始于朱熹此书。

元初，理学北传、普及和立为官学，是程朱理学作为封建官方哲学地位确立的重要标志，也是元代社会思潮的基本特征。反映到学术史的编修上，就是《宋史·道学传》这一官修理学史卷的设立。元代官修《宋史·道学传》一反历来正史立传，“道学”、“儒林”不分家的惯例，首次于《儒林传》之外另立《道学传》，专门为程朱及其重要传人立传，叙述程朱理学的源流，而将理学中的心学一派排除在外。因此，尽管南宋心学开派人物陆九渊与朱熹齐名，但是，由于他的心学观点与程朱异趣，故他本人及其传人只能入“儒林”而不能入“道学”，充分反映了《宋史·道学传》强烈的“道学宗派”意识。其直接受元代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明初，《性理大全》、《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的诏修、颁行标志着程朱理学，特别是它的典型形态——朱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为理学修史表现出鲜明的朱学特色。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程瞳的《新安学系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谢铎以“续”朱著《伊洛渊源录》之“意”为己任，专门为朱学确立上承二程伊洛之学的历史统绪，为朱学续道统之传。故此书以朱熹为宗主，以朱学传人为大宗，专门述其授受源委和道统传承。程瞳以朱熹的祖籍新安名其书，旨在表彰朱熹学派在新安的传人，为其明“道”续“统”，远绍孔孟之道，近承周程之学，而以朱熹为得道学之宗传。

明代中期，王学异军突起，风行海内，其传人遍及大江南北，从

而打破了前期朱学独尊的局面。尽管如此,朱学作为封建官方哲学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朱学与王学之争成为这一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其时,人们对朱学与王学的态度,有尊朱宗王,亦朱亦王和非朱非王之分。反映到学术史的编修上,就表现为:尊朱学者专门为程朱理学修史,如朱衡的《道南源委》,“循源竟委”,为二程伊洛之学的南传辨源流;宗王学者专门为表彰陆王心学而修史,如周汝登的《圣学宗传》,以“心”为宗,以心学为“圣学”,旨在建构以心学为正宗的“圣圣相传”的系统,从而为陆王心学确立上承“圣学”的历史统绪;亦朱亦王者专门为综合程朱陆王的学术异同而修史,如冯从吾的《关学编》和《元儒考略》,兼综各派,“统程朱陆王”为一史,旨在辨“关中道统之脉络”,考元儒道学之源流,分别为之明“道”续“统”。至于非朱非王者,是指超越程朱陆王学术异同之辨而径直为经学修史者,如朱睦㮮的《授经图》,以述经学源流为职志,破“一禀宋儒”之学风,救“汉学之失传”,旨在去宋(学)归汉(学),由理(学)返经(学),为学术史的编修另辟蹊径。

清初,鉴于明末理学“清谈误国”的教训,许多学者纷纷从理学的角度探讨明亡的原因。因此,使这种探讨具有批判、总结理学的性质。这是清初社会思潮的重要特点。在清初这一社会思潮的冲击下,理学势颓,代之而起的是主张尊经重史、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反映到学术史的编修上,就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情况:一是,为挽救理学势颓,以“卫道”为己任的理学家试图借为理学修史来重振理学。他们或者通过强化“道学宗派”意识来为理学修史,尊程朱而辟陆王,如熊赐履的《学统》、张夏的《雒闽源流》、窦克勤的《理学正宗》和耿介的《中州道学编》等,就是属于这方面的理学史之作;或者通过淡化“道学宗派”意识,折衷程朱陆王的学术异同来为理学修史,如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和汤斌的《洛学编》,就是属于这方面

的理学史之作。二是,为转变明末以来理学清谈的学风,主张尊经重史的学者试图借为经学修史来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他们或者总经学家与理学家为一史,同尊经学与理学为“正学”,如魏一鳌的《北学编》、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和上述汤斌的《洛学编》等,就是属于这方面的学术史之作;或者专门为汉唐经学家修史立传,独尊经学为“正学”,如陈遇夫的《正学续》。三是,借为宋明学术辨源流,清学脉,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总结。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全过程,深入地辨析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发展脉络,全面地综论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因此,堪称为关于宋明理学发展的总结性著作。

清代中期,学风丕变,它一反清初重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转而提倡“专门汉学”即乾嘉汉学。乾嘉汉学之兴是一场复兴古学的运动,旨在恢复东汉古文经学的治经传统。学风的转变导致编修学术史重点的转移,由理学转向汉学。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国朝汉学师承记》专门为清代汉学家修史立传,旨在表彰汉学,提倡他们的尊汉信古的治学精神。即使是以考镜理学(宋学)源流相标榜的学术史,观其内容也重在辨正理学与经学、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名为提倡汉宋兼采,实则重在凸显汉学而以宋学为附庸,如江藩的《国朝宋学渊源记》、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和尧祖韶的《江西理学编》等,均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由此可见,清代中期学风的转向直接影响到当时学术史编修的走向。

清代后期,社会剧变,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深。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转向现实,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于是,经世致用思潮在沉寂多年之后再度兴起。其特点是:把

缓和社会矛盾和挽救社会危机同文化批判和转变学术风气联系起来,其矛头所向直指严重脱离实际的汉学和宋学。汉学和宋学遂呈颓势,代之而起的是素以“通经致用”著称的今文经学。与此同时,西方近代文化乘势而入,“西学东渐”已经成为文化潮流,它引发了尔后的中西文化论争。清代后期的文化走向决定了这一时期学术史编修的格局:

一是,为挽救汉学与宋学的颓势而修史。例如,潘世恩的《正学编》借表彰程朱理学以救“正学”之“失传”;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借“精选其所以发明程朱者”为明清两朝“续”程朱理学之统绪;汪佑的《明儒通考》为“明儒”“别其宗派”而以程朱理学为大宗;唐鑑的《国朝学案小识》以“卫道辨学”为程朱理学“存道脉之真”;王棻的《台学统》和徐定文的《皖学编》以汉宋兼修来为经学与理学补偏救弊;等等。这是借为理学和经学修史来重振汉学和宋学,堪称“为汉学和宋学扶危济困的学术史之作”。

二是,在为汉学修史的同时,注意为今文经学家立传。例如,张星鑑的《国朝经学名儒记》,虽“以汉学为宗”,但不排除为清代有影响的今文学家立传;汪大钧的《传经表补正》借为《传经表》作“补正”来表彰两汉今古文经师;等等。这反映了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崛起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文化走向对传统形式的学术史的编修所产生的影响。

三是,为提倡实学而修史。例如,云茂琦的《实学考》旨在考证两汉以来的“实学”源流,其考证范围包括: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思想和理学家重躬行力践的修身养性功夫;戴望的《颜氏学记》借考察颜元及其学派的思想源流以表彰颜李学派所倡导的经世实用之学;等等。这是反对理学空谈,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